

康赫小说《人类学》

打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城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辰龙

在新浪的好书榜上,《人类学》从四月份开始牢牢占据着第七名的位置,倍受读者喜爱与推崇。作家叶匡政说,康赫的小说,表现的总是当代汉语的各种声音,《人类学》记录的就是北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各种声音。

上世纪初,在帝制中国的最后岁月,法国诗人、汉学家谢阁兰来到北京,在写给妻子的书信中他称这座城市为“我的城市”,迷恋的热枕,转化为充沛的想象力,在小说《勒内·莱斯》中,借助主人公的奇幻之旅,谢阁兰虚构了一个隐藏于北京地下的幽暗城市,它有城堡与角楼,由深邃的通道联结着,却不愿向更多人敞开口。日后,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也曾朝向东方,言说“看不见的城市”,而对小说家康赫来说,当他试图用小说《人类学》讲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城,他的诗学问题将是写作主体如何回忆一座看得见的城市。

《人类学》以一个社会科学的标题,叙述人生存于当下的状态。

1993年,康赫从家乡浙江来到北京,在一篇访谈中他讲道:“九十年代初,大家兴冲冲地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涌进来,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那时候到圆明园,大家在吃面条,白菜一锅,电热炉烧着,十来个人,大家有饭一起吃。



我一直关注九十年代,一直记录九十年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肌理比现在有趣多了,现在感觉一抹平。”可见,他是对比着自身本世纪以来的现实感,来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体验进行定位、定性,这种内在的时差,使小说中的北京被来自各种方向的记忆断片重组着,每一个小标题下的叙述都似乎是整体时间的中断与重启,它们相互链接,却又不时彼此反对,形成了抗辩式的结构。北京之于康赫,不是记忆的起点,不是主体意识最初生发的源地,因而,在他带有追忆特征的写作中,没有重返者的情怯与忧郁。康赫的起点是语言,确切地说,是南方

方言,正如小说开端,麦弓这一角色初到北京,首先发出的声音是面向同乡的地方话,紧接着,他不得不校正声音的调式,来与说着北京话的房东进行交谈。

声音是理解《人类学》的切入点之一,包含两个方面:人的声音与空间的声音。在这部兼具典型十九世纪文学体量与现代主义形式野心的长篇巨制中,它的推进动机便是“交谈”。文本内部,“在九个月里,一百多人轮番登场,有房东,有大学生,有外交官,有亿万富翁,有文人,有演员,有银行行长,有艺术家,有跟爸爸赌气剃了一个手指的从西北来的年轻人等等。”这些背景迥异或来历不明的各色人等,喋喋不休,进行着时常陷入无聊的、带有杂乱特征的“交谈”,而“交谈”的另一种形式在小说中是性爱,是身体语言的羁绊、缠绕。在不同话语进行交锋或交错的间隙,则穿插了个体与自我的“交谈”,即朝向虚空的独白与恍惚的意识流。有时,为突出“交谈”时话语的冲突与错位,康赫会直接调用戏剧的体式。倘若将北京城视为凝聚当代状况与隐秘心思的空间切片,以“交谈”推动叙事的结构,首先意味着同时代者不同的现实感,而频繁出现的南方方言,以执拗字词的陌生化形式,将空间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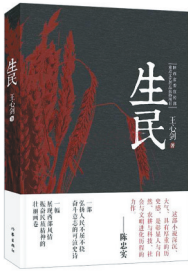
作为对立面提示了出来,这种空间声音带有隐匿性,却始终笼罩于众生喧哗之上。

空间的声音,它在小说第一章,便显形为被规训过的标准普通话。先是房东女儿,“她开始背课文,用小学里通行的一步一抑扬宣叙调,赞美一位援藏干部的无私奉献。‘这样的声音以后就是新闻联播。’我说。布蓝没笑。‘他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小女孩每次背到这里就卡壳。”有意味的是,以小女孩的声音作为背景,“我”与伴侣正酝酿着下一次身体语言的黏贴。在第六章“北京站”一节与第九章“太平街甲8号”一节,没有具体的面孔,只有声音拥挤在一起,它们来自车站的高音喇叭,来自商贩、旅客、上访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声音处于单向度的状况,本应得到的回复之声在文本中持续地缺席,而它们之间也没有形成共同体的契机与可能。每一个来自个体的声音都试图将嗓门提到最高,在彼此遮蔽的对决之下,它们终究也消解了自身,空间的声音则保持沉默,如旁观鹬蚌的隔岸强者。

当康赫用百万字将麦弓与北京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打捞出来,在完成记录的同时,便也以背向时间的方式与哀悼者姿势,完成了一次告别,一次纪念。图

新书推介

王心剑长篇小说
《生民》推出受捧



本报记者近日获悉,陕西作家王心剑寓居海南时杀青的长篇小说《生民》,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后,得到了新华书店及各大

售书网站的青睐。这是一部反映民国时期关中平原农业科技播洒题材的小说,以农业科技推动社会进步,改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为主题,有力凸显出陕西人心存正道,咬透铁锹也要把事弄成的倔劲与创业精神。

小说刻画了关中平原在民国十八年罕见年饑中,大饥荒造成的饿殍遍地哀鸿遍野的凄惨情相;描绘了不忍见生灵涂炭的水利专家和社会精英在极端困难状态下,兴修泾渭八渠救民出水火的悲壮历程;生动地记述了先辈在经费奇缺物质匮乏时,创办农业大学扶植农桑拯救民瘼的良苦用心和远见卓识,重现了他们传奇般的人生故事。

小说《生民》一推出,就颇受媒体和业内关注,多个网站对其进行了转载。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称,这是一部弘扬人民不屈不挠奋斗意志的可泣史诗;一幅展现西部风情振奋民族精神的动人画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对其也不吝赞美之词:这部小说深沉、大气、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是彰显人与自然、农耕与科技、社会与文明进化历程的力作。

据了解,《生民》作者王心剑,是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人,西安石油大学教授,长期担任写作学教学工作,业余从事文艺创作。所著长篇小说《生民》是作者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作期间,深入生活十六年,不断搜集积累素材,精心构思的心血结晶。该作品曾入选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作品扶持项目。

(小文)

林森小说《暖若春风》

连接历史和现实的血脉

文\本刊特约撰稿 符力

最近,海南青年著名小说家林森的长篇小说《暖若春风》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在题材的选取上,《暖若春风》着眼于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有关的乡村、小镇和城市生活,并通过对起伏变化的情节的叙述与描摹,来反映作者对这座海岛上的人们的生存与命运、观察与发现,乃至对自身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寻找。

《暖若春风》从作者现实生活中的友人那日渐散尽的家族故事开始,讲述一个虚构的家族里的浪子不断离家与归来的故事——四代人,每人身上都有自己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现实让他逃离,成为浪子;现实又让他返乡,成为归客。小说里繁杂的家族故事,跟那个友人的不少家族故事形成虚实对照与呼应关系,读来似真似幻,别有一番趣味。

关于那个友人的家族故事,作者有如下概括:“随着撤离海南岛的部队前往台湾的曾祖父,在离乡多年后回来,随后死在故土。曾祖父的归来,在带给子孙新的生活希望的同时,也埋下了阴影,直到他死去多年,那种笼罩



性的阴影也一直没能散去。时代变迁,几代人各藏心事,无论是爱情与亲情,都经历了极大的考验,甚至希望逃离家园。长者们穷于应付,近乎发狂,而年轻的心灵则陷入迷惘和无奈。”相比之下,小说里所讲的几代人的流浪与返乡,所写的在时代变化面前的无力与坚韧,若当作一代青年的心灵书来看,其内涵与外延,皆远超这个现实版的家族故事。对于小说里的这个虚实交织的家族故

事,作者称之为“大时代的后遗症”:大时代过去之后,世界都有些破碎了,我们今天的的生活,其实都是那个大时代所留下的后遗症。

较之于他的好几个中短篇小说,《暖若春风》里对错综复杂的情节描摹,着实不乏“精准、灵动”;其叙述,又不能不说是繁杂的,绵密的。尽管如此,他的叙述本身所呈现的沉着、内敛状态,给人很深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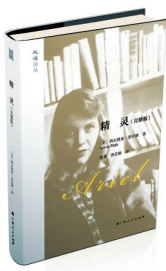
评论家吴秉杰先生认为“林森的小说具有一种要把人生的两部分——过去和现在,乡村和城市联系起来表达的追求”,这看法是中肯的,当然,也应看到那样的追求跟林森本人亲近城市却没有远离乡村的生活经历,以及个人的文学需要有关,而不是单纯的写作上的一种倾向。毕竟,他很早就把老家澄迈和如今生活的海口,作为两大块水土相连的文学地理来建设着。

林森文学意义上的澄迈和海口,充满现实生活写作素材。《暖若春风》里所写的逃离又回归的浪子——“我的叔叔陈可文”,因吸毒而丢掉性命,给家人带来沉

痛的打击,这在澄迈瑞溪镇是可以找到人物原型的。这表明林森的小说写作紧贴现实生活,既取材于寻常生活,又能从生活中提炼出更为丰富、深化的内涵。

林森在小说中描述一个大时代过去后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难以捧起来的废墟,其实在另一种程度上,接上了被当前碎片化所击毁的历史暗线,从另一个维度,揭示了当前现实的复杂和所有缘起。熟悉林森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在长篇《关关雎鸠》中,以一种浩繁的笔力,对农业文明的破败与逝去,做出了某种哀鸣般的招魂,他所书写的“军坡节”这种带着独特仪式感的民间节日,是中国民间不绝如缕的精神场域。而写于《关关雎鸠》之前的《暖若春风》,要探讨的问题则完全不一样。《暖若春风》在形式上有着独特的追求,双线的叙述,让现实与精神两条线互相纠缠,虚实的彼此呼应,历史的暗线偶尔抬头,让人对现实浑然一惊。林森要讲述的,也绝不是仅仅要呈现海南岛的生活,他的野心,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寻找到那条从不断绝的血脉。图

《精灵》(完整版)



作者「美」西尔维娅·普拉斯译者陈黎张芬龄

《精灵》(完整版)以弗莉达·休斯整理出版的《精灵》手稿还原本为基础,另附休斯编辑的英、美版选入诗,共收录诗歌55首。《精灵》是普拉斯最后也最重要的诗集,被媒体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集之一”,“20世纪出版的最动人和最受人喜爱的诗集之一”。

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美国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自白派代表诗人,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女诗人。